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第一冊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第二冊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第三冊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第四冊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第二冊

吳文治編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第三冊

吳文治編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第四冊

吳文治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(全 四 冊)

吳 文 治 編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54⁵/₈ 印張·1,136 千字

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9,500 冊

統一書號: 10013·509 定價: 6.05 元

前言

韓愈是我國中唐時代傑出的散文家和詩人。爲了摸清楚歷代學者對他研究的底細，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，我在廣泛蒐集柳宗元研究資料的同時，便也着手蒐集有關韓愈的資料。所以這部資料集，實際與我所編的《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·柳宗元卷》是個姊妹編。

從本書收錄的資料中可以看出，歷代對韓愈研究人數之多，超過柳宗元；歷代對韓愈及其詩文的評價，意見也相當紛雜。爲了使讀者對歷代研究韓愈的底細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，本書對各種有代表性的評述意見，都儘可能地加以輯錄，以供參考。

一

關於韓愈的思想，是歷代學者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。各種意見的對立與論辯，在這一方面表現得最爲集中，最爲明顯。

有關韓愈崇儒排佛的議論，大體上存在三種不同的看法：一種是肯定韓愈排佛的積極意義，認爲他那樣做是爲了「息民患」，「行聖道」石介；說他「焦心苦思，東奔西走，食不待飽，而衣不務華」，「以關佛爲畢生大事業」，都是因爲「上以憂斯民，下以明斯道」宋濂、吳闓生，「真可謂豪傑之才」薛瑄；他排佛，

佛學「雖不能以愈言而息」，但至少可以「使後世亦知其非」，「不致於和聲附影，流於邪僻之說」〔章懋勳，所以人們稱贊他「祇排異端、攘斥佛老之功」，「不在孟子下」王十朋。另一種看法是對韓愈排佛採取否定的態度，認為「韓退之抗表佛骨，攻擊佛法，不遺餘力，及一見大顛，乃曰和尚門風高峻」，說明他是「攻其皮，嗜其髓」，實際上是「善護佛法」袁宏道；他們批評韓愈「闢佛老而事大顛」，是「流入異端而不自知」陳善。還有一種看法，是認為韓愈對佛學亦有所取，說他「嘗遍觀佛書，取其精華而排其糟粕耳」司馬光。

對韓愈排佛問題的看法，所以會產生這麼大的分歧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是由於韓愈與和尚們交往頻繁。人們認為，「昌黎不讀浮屠書，亦不作浮屠文字，然於大顛、高閑、文暢之屬，健羨丁寧，累書珍重」〔孫緒，仿佛是一個矛盾，不能理解。有人就曾經直率地對此提出問題，說「闢佛者莫嚴於昌黎韓子」，但「其《送靈師》一篇」，對靈師「反津津稱道不已，何也」汪琬？對這種矛盾現象，自然會有種種不同的解釋。有人說，「退之屈論於大顛，而稍信佛書」，但他「始惑而終悟」〔耶律楚材；有人說，韓愈「於佛不喜其說，而喜其人」，所以「韓之門有惠師、靈師、令縱、高閑、廣宣、大顛之徒」方回；有人說，「退之之交大顛」，「非崇信其法，求福田利益」，「而後世佛氏之徒，張大其事，往往見之圖畫，真若弟子事嚴師者，則其誣退之甚矣」王守仁。這些不同的解釋，在對韓愈寫給一些和尚的書信的看法上也有所反映。例如《與大顛書》一篇，蘇軾就力言其為偽作，以為「其詞凡陋，退之家奴，亦無此語」。歐陽修、朱熹則力辯以為真，認為「此文非退之不能作」。此後，楊慎、胡應麟、姚範等人，又擺出種種理由進行反駁，認為這

是偽作，批評「朱子於此，實亦枉費心力」。這種紛爭，長期持續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。

韓愈一貫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，對此，蘇軾與朱熹等人却都並不以為盡然。蘇軾雖然在給韓愈寫《廟碑》時，曾稱頌過他「道濟天下之溺」，但在《韓愈論》中，就指責「韓愈之於聖人之道，蓋亦知好其名矣，而未能樂其實」，認為「其論至於理而不精，支離蕩佚，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」。朱熹對韓愈是曾經作過一番潛心的研究的，但他以道學家的眼光來看人，認為韓愈「所原之道，則亦徒能言其大體，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」，他指責韓愈在「其師生之間，傳授之際，蓋未免裂道與文為兩物，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，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」。後來，清初王夫之也「嘗判韓退之為不知道」。對於上述這些對韓愈的批評和指責，歷來也有不少人持反對的態度。如明人薛瑄就認為，「此乃責備賢者之意」，是「妄論前賢」。其實，從實際來看，韓愈崇尚儒家之道，以道統繼承者自居，也確實並非真的完全迷戀於道學。正是由於這一點，所以他的散文才不像宋代道學家們那樣有濃厚的道學氣。

就哲學思想而言，韓愈信「天刑人禍」之說，當然是非常錯誤的。所以在柳宗元、劉禹錫與韓愈關於對「天」的認識以及作史問題的論辯中，歷來有許多評論者，都對韓愈相信「天」能「賞功罰禍」之說持批評的態度，認為「退之深畏天刑人禍，退之不及子厚」^{李塗}。有人還就韓愈所列「不有人禍必有天刑」之說的論據，一一進行批駁，指出其決「非至論」^{王禔}。人們肯定柳宗元在《天說》、《與韓愈論史官書》中對韓愈提出的批評是「正論」^{黃震}。但是，也有一些人支持韓愈「天」能「賞功罰禍」之說。如清人邵長蘅，就攻擊柳宗元《天說》對韓愈的批駁為「其說詭已」；而對韓愈的觀點，則表示「以為信」。關於韓愈

因畏「天刑人禍」而不願作史官一事，也有人公開替他辯解開脫：一種說法認為「其言人禍天刑爲禍福報施之說」，是因爲「此文所言，皆非莊語，乃故謬悠其詞，以爲文章詭異之觀」，認爲像韓愈這樣的「有道君子，未有惑於禍福之謬說者」吳闓生；一種說法認爲「退之之避史筆」，是由於「《淮西碑》以失實而踣，而段文昌改撰之」，《順宗實錄》以不稱而廢，而韋處厚續撰之，《毛穎傳》足繼太史，乃當時誚其滑稽，「使退之而任史，其禍變當有甚此者」王應麟。這些解釋，似是而非，不一定都符合韓愈當時的思想實際。

至於韓愈從先驗論的觀點出發，把人性分作上、中、下「三品」之說，這在後來的中國哲學史上，也是長期聚訟紛紜的公案。一些人表示肯定和贊揚，認爲「退之之辯，誠爲得也」李觀。他們說，「自孟子後，論性惟韓子爲純粹」。「三品之說，蓋孔子唯上智下愚不移之意，兼氣質而言也。是雖不明推出氣字，而意已在其中矣」薛瑄。但是，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對，認爲「其論終莫能通」蘇軾；他們甚至「疑三品之論，非退之文章」王正德。這種論戰，雖今天已不復存在，而以往却是哲學領域中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。

二

對於韓愈在政治上的評價，歷代評論者也存在着較大的分歧。譽之者，極力稱頌其德政。如皇甫湜便列舉事實，說「關中旱饑，人死相枕藉，吏刻取怨，先生列言天下根本：民急如是，請寬繒民徭，而免

田租之敝」；說他「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，前後三貶，皆以疏陳治事，廷議不隨爲罪」。李翱也說：「平蔡州事，朝廷有分歧，宰相武元衡因主戰而被殺，『唯公（韓愈）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，其爲儒甚大，兵不可息』；與裴丞相議合，故兵遂用」，「丞相請公以行」，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」，「爲行軍司馬」。人們稱頌他「操行堅正，鯁言無所忌」，「有愛在民，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」宋祁；稱頌他「有忠君愛國之心」章懋勳，說他「匡君之心，一飯不忘；救時之念，一刻不懈」薛雪。並有詩云：「宣仲夾谷叱強齊，吏部深州破賊圍；始信真儒能見用，可爲邦國大皇威。」王令 又云：「中唐風節數韓公，詎止文章一代雄；異類強藩盡低首，王廷湊與鱷魚同。」洪亮吉 在這裏，韓愈不僅被描繪成是一位能爲民請命的文臣，而且是一位富有謀略的武將。然而，在另一些人的評論中，却又把他說得相當卑微。例如朱熹就批評韓愈，說他「平生意鄉之所在，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，時俗富貴利達之求」。清人劉開也批評說：「昔韓退之上書於執政，唯急於干祿而求效力當時，故君子譏其躁進。」朱熹甚至還把韓愈與王通作比，認爲王通「以是天下爲心，分明是要見諸事業」。而韓退之「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，始終只是這心。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，便以爲傳道。至其每日功夫，只是做詩博奕，酣飲取樂而已」；「至其做官臨政，也不是要爲國做事，也無甚可稱，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」。在朱熹等人的眼裏，韓愈在政治上簡直一無是處。當然，我們今天來看，韓愈在政治上是有其保守的一面的，例如他對柳宗元參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團的指責便是。但客觀地說，從政治上評價韓愈，既不能只看其保守的一面，或武斷地說他「做官臨政」，「不是要爲國做事」，「無甚可稱」；也不應一味加以美化，把他作爲封建社會中完美無缺的政治家或軍

事家來吹捧。應該如魯迅先生評價陶淵明時所說的，必須看其「全人」。歐陽修最崇拜韓愈，他在《與尹師魯第一書》中說：「前世有名人，當論事時，感激不避誅死，真若知義者；及到貶所，則感恩怨嗟，有不堪之窮愁，形於文字。其心歡戚，無異庸人。雖韓文公不免此累。」歐陽修既肯定韓愈在政治上有積極的一面，同時又指出其確實也存在着軟弱的一面。這樣說，似乎還比較公允一些。

韓愈被貶為陽山令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？歷來有不同說法。新、舊《唐書·韓愈傳》，都說是由於「上疏極論官市」。皇甫湜《韓文公神道碑》、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、洪邁《容齋隨筆》等，認為是由於「關中旱饑」，「請寬繒民徭，而免田租之敝」。而方崧卿、全祖望、王鳴盛、趙翼、章學誠等人，都認為「實為韋（執誼）、王（叔文）之黨所排」（但「子厚必無排退之之事」），認為「《神道碑》謂論旱饑，本傳謂論官市，皆非致禍之本」。他們都引韓愈《江陵途中寄三學士》、《岳陽樓別竇司直》等詩為論據，雖頗有見地，但也並沒有形成為學術界所一致公認的結論。

三

韓愈在散文方面的成就，歷代評論者幾乎都異口同聲地給了他最高的評價。和他同時代的劉禹錫，就稱他「為文章盟主」，說他「手持文柄，高視寰海」，「三十餘年，聲名塞天」，「一字之價，輦金如山」，宋人蘇軾，推崇他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；曾鞏《雜詩》則云：「韓公綴文辭，筆力天乃授，並驅六經中，獨立千載後。」金人李治，甚至認為「文至於韓退之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」。這些贊譽之辭，都說明他的散文在中

國文學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。

韓愈提倡「文以載道」，但歷代評論者們對他文章中「文」與「道」的關係的看法，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。持肯定態度的一派，如歐陽修便說：「有道而能文者，莫若韓愈」，認為「韓氏之文之道，萬世所共尊，天下所共傳而有也」。他們肯定「唐代文章，惟韓愈能近道」沈德潛，贊揚「退之諸文，多有功於吾道，有補於世教」李奎，說他「修業明道，語關世教，言言有物」方東樹。明人王禕，還曾對韓愈的「文以載道」說作過專門的闡述，說韓愈的「文」是他「道之所由託」，「道與文不相離，妙而不可見者之謂道，形而可見者之謂文。道非文，道無自而明；文非道，文不足以行也。是故文與道，非二物也」，「文不載道，不足以爲文」。他這樣理解韓愈的「文」「道」觀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持否定或懷疑態度的一派，如張耒就批評「韓退之，以爲文人則有餘，以爲知道則不足」。道學家陸九淵，雖肯定韓愈爲唐代「文章宗伯」，却批評他「因學文而學道」，「是倒做」。類似的看法，在後來的評論者中也不乏其人。如清人蔡世遠，就認為「韓公本因文見道者」，廖燕指責昌黎「見道未徹」，說他的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諸篇，膚淺已甚；明人方孝孺，也「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」，批評韓愈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，不能造顏、孟氏之域，爲賢者指笑」。這些批評指責，無非旨在要求韓愈把他的文章寫作完全納入到道學的樊籠中去。那樣做，要求韓愈在散文革新中立「起衰」之功，將是不可想象的。他散文成就之所以能高出於宋代的道學家們，其實恰恰就在於他沒有完全被迂腐的道學所羈絆，能够在散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有所創新。

韓愈的散文是非常講究氣勢的。皇甫湜曾極口稱贊「韓吏部之文，如長江大注，千里一道，衝飈激

浪，汙流不滯」。蘇洵接過皇甫湜的評語，又增加了新的內容，他說：「韓子之文，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龍蛟龍，萬怪惶惑，而抑遏蔽掩，不使自露，而人望其淵然之光，蒼然之色，亦自畏避，不敢迫視。」茅坤也說：「吞吐騁頓，若千里之駒，而走赤電，鞭疾風，常者山立，怪者霆擊，韓愈之文也。」他們以奔騰不息的長江浪濤和瞬息萬變的迅雷閃電，來比喻韓愈散文氣勢的充沛，既形象，又貼切。清代有不少人曾經就韓愈優秀的散文都氣勢充沛這一點作過探討，提出過一些很好的見解。林紓認為，「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」，是由於「理足而神王」。黃子雲認為，韓愈散文之所以寫得好的奧秘，就在於能善於「鍊氣」。他說：韓愈之文，「無句不琢，却無纖毫斧鑿痕者，能鍊氣也；氣鍊則句自鍊矣。雕句者有迹，鍊氣者無形」。鄧繹曾經批評韓愈「言文章之氣，先於骨幹」，「而不推源於帥氣之志」，是「未為知本」。陳衍就反對鄧繹的這種批評，認為「氣」與「理」本不可分，「言氣而理亦在其中」，如「必兼言理」，那末文章就勢必「質實而乏妙語」。林、黃、陳等人的這些見解，都是頗懂得散文寫作的藝術匠心的。

韓愈自述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」，他的散文取得那麼高的成就，到底主要得力於誰？歷來有不少人就這個問題作過探討，但其說不一。有人認為「韓愈之文出於經」劉成德，「宗經而不宗史」章學誠；有人認為「韓子之文祖於孟子」貝瓊，「深造孟子，陶鑄子長，勒一家之言」儲欣；也有人認為，韓文「妙處，實本太史公」，只因「此老稍能自秘，示人以高，固未嘗尊稱遷、固，至其平生受用，則實得於此」劉瓛、鄧繹；還有人認為，「昌黎大家，其文不模《史》、《漢》，而自得其精神」徐學謨，他雖「學子長，而不似子長」吳喬。諸如此類的說法，不勝枚舉。清人劉開和劉熙載，曾在前人對這個問題廣泛進行探討的基礎上，提出

過較爲全面的看法。劉開曾說：韓退之所以能「獨成一家之文，此一家者，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，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。非盡百家之美，不能成一人之奇；非取法至高之境，不能開獨造之域。此惟韓退之能知之。」劉開認爲，「退之起八代之衰，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；但取其精而汰其粗，化其腐而出其奇。其實八代之美，退之未嘗不備有也」。後來劉熙載也說：「韓文起八代之衰，實集八代之成。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，以無所不包，故能無所不掃也。」這些論述，充滿辯證的思想，說得何等精闢！韓愈散文之所以能取得那麼高的成就，決不是由於他能專學某一位或某幾位古人，跟着他們亦步亦趨；而是由於他既能善於廣泛向前人學習，又能善於獨創。就如韓愈自己所說的，「能自樹立，不因循者是也」。

韓愈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卓越貢獻，歷代學者都是有口皆碑的。李翱曾說，在韓愈生前，「後進之士，其有志於古文者，莫不視公以爲法」。趙璘也說，「韓公文至高」，「以引接後學爲務」，「元和中，後進師匠韓公，文體大變」。宋代散文家多學韓愈，他們對韓愈在古文運動中的功績，注意到了把他放在散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去進行評價。如司馬光在《答陳師仲司法書》中便說：「文章自魏、晉衰微，流及齊、梁、陳、隋，羸備纖靡，窮無所之。文公傑然振而起之，如雷霆列星，驚照古今；自班、張、崔、蔡，不敢企仰，況潘、陸以降，固無足言。」蘇軾在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中也說：「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異端並起，歷唐貞觀、開元之盛，輔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。獨韓文公起布衣，談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，蓋三百年於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。」這些評論，已成爲後來評價韓愈在古文運動